

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

周谷城题

郝平逸主编

编辑单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湖北省文化厅

湖北大学

湖北通山县人民政府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自成殉難於湖北通山史証

郝孚逸 主編

編輯單位：

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

湖北省文化廳

湖北大學

湖北通山縣人民政府

武漢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七·武昌

内封书名题字：李尔重

责任编辑：张虹

封面设计：黄传琳

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湖北省文化厅
湖北大学合编
湖北通山县人民政府
郝孚逸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彩页印刷：7218工厂

850×1168毫米1/32 5.125 印张 32开插页一页

彩色及黑白照片插页各一页 128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307-00097-O/K·4

统一书号：11279·20 定价：1.30元

100-50

目 录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归宿问题考实·····	李文治 (1)
李自成的归宿问题·····	姚雪垠 (8)
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李自成的归宿问题·····	孙祚民 (41)
试论李自成后期的军事行动·····	王致远 (52)
再论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牺牲的经过及其墓葬问题 ——兼评“石门说”、“南进说”及“通城 说”之误·····	张国光 李悔吾 (60)
关于李自成之死·····	童恩翼 (83)
奉天玉决非李自成补证·····	秦 晖 (100)
李自成由西安向九宫山转移路线史实考辨·····	智夫成 (107)
关于李自成殉难于九宫山说之确立 ——回忆五十年代初《历史教学》、 《历史研究》所开展的一场讨论·····	王如江 (125)
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学术小结·····	冯天瑜 (128)
史实愈辨愈明 ——三十年来关于李自成殉难年月、牺牲地 点与墓葬问题的讨论述评·····	李悔吾 (132)
全国研究明清史专家学者集会锤定 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无可置疑 ——《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 ·····	王金怀 (141)
附 录	
地方志乘中关于李自成殉难于 通山的资料辑录·····	湖北省通山县文化局 (147)
编后记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归宿问题考实

李文治

明末农民战争，有不少重大事件，在文献史料中，或记载不够具体，或互相矛盾。我们虽然不能把历史科学搞成考据，但有些重大问题仍然需要考证。考证主要靠掌握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文献和文物资料，根据资料进行论断。经过考证，最后可以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摸了一下，有些问题迄今也没有搞清楚。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在《晚明民变》中，如李自成殉难通山县九宫山，“为僧之说绝非事实”等，只聊聊天语，过嫌简略。现为此文并无其它新见，只是对旧说加以补充。

一、夹山奉天和尚非李自成考

1941年，我随机关离开昆明搬迁四川南溪县李庄，有一个时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查阅有关明末农民起义文献资料，其中有的涉及李自成夹山为僧问题。我以《明史》已有定论，初未介意。以后看到《广虞初新志》所载《李自成墓》条，记述乾隆年间澧州知州何璘亲赴石门县夹山寺事，谓寺旁有塔，塔书《奉天玉和尚》，“和尚顺治初入寺，事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又谓寺中藏有和尚遗像，状貌与《明史》所记相同等等，何璘即据此进行推论：自成曾称“奉天倡义大元帥”，继称“新顺王”，此僧实即李自成。他又对“奉天玉”加上自己的注解：“其曰奉天玉和尚盖自寓，加点以讳之”。（《广虞初新志》，卷十三，《李自成

墓》，此条转据乾隆《澧州志林》）记载如此生动具体，在我脑中打上深刻的印象，及今四十多年记忆犹新。

关于何璘这种论说，我当时即抱怀疑态度。最近从《文物天地》杂志看到有关奉天与野拂二僧塔文铭文，有的作者据以论断李自成出家为僧。其实事实刚刚相反。以下试将碑铭文摘录有关段落加以论述。据康熙《奉天大和尚塔铭》，谓“师（奉天和尚）于大清壬辰年（顺治九年，1652）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历尽清要，风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歿于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又据康熙四十四年《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谓“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驻锡，思复旧观……时顺治壬辰夏月也……是年（壬辰）冬，则野拂和尚从鼎州（常德）而来，投老人披剃，更不惮勤劬，跣足超化者三年，稍为修葺”。碑尾列立碑者姓名，第一名即石门知县黄清。距奉天和尚墓约十米处有野拂和尚塔，塔建于康熙壬午年（四十一年）。由顺治至康熙数十年间所有碑文塔铭，都看不出奉天和尚和李自成有什么联系，只反映出奉天与野拂两僧私人关系密切，何璘关于奉天和尚即李自成的判断完全出自主观臆测。我是这样考虑的，如奉天和尚确系李自成，正是清朝所要缉捕之人，石门魏县令绝对不敢对他下“请书”，黄知县也不敢为之树碑立传，因为这不仅有欺君之罪，乃至有杀身灭门之祸。但是我曾有过这种“设想”，奉天和野拂两僧有可能是李自成所部臣将，自成既死，不愿归清，乃出家为僧。我以“奉天玉”法号比较特殊，曾一度设想为大顺臣将怀念李自成的“自寓”。

去冬自黄山会毕回京，查寻《文物天地》所载野拂和尚墓碑文，发现我的上述“设想”也是错误的。据野拂碑文：“老禅师（野拂）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抱经天纬地之才，久恨权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无如戎马屡乘，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竟甘泉石之栖。”此碑立于咸

丰十一年（1861），墓碑在湖北慈利县。碑文把野拂和尚的历史作了粗略描述，他原是一位效忠明王朝久历沙场的武将，他不仅和清兵打过仗，也同李自成农民军交过锋。此碑虽然建立较晚，从野拂活动考察，事实是可以信据的。根据碑文，我们可以作如此推论：顺治九年，天下大势已定，明朝恢复无望，他才到夹山投奉天和尚披剃的。这时奉天和尚来此不久，而两人关系却很深。如果奉天和尚是李自成，乃是逼死崇祯皇帝的“首恶”，对忠于明室的野拂和尚来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野拂不会投拜他为师，更不会对他如此毕恭毕敬。从二僧的亲密关系倒可作如下推论，奉天和尚很可能是忠于明王朝的臣将。两僧均系明朝遗老，有共同遭遇，不愿折节事清，才隐瞒姓氏，到石门县夹山寺为僧以终的（碑文铭文见《文物天地》，1982年第5—6期，1983年第1期）。

当初我写《晚明民变》，所作李自成“为僧之说，绝非事实”的论断（《晚明民变》，页158），即针对何璘臆测而作。当时我之所以否定李自成削发为僧而坚持战斗以殉之说，除尊重明清双方负责长官奏报之外，也有自己的主观推论：第一，这时自成所部数十万农民军尚在，跟随多年共同战斗的将官尚在，夫人高氏尚在，在这种情况下，自成一人逃遁为僧难以设想，其次，在农民起义众首领中，自成战斗意志最为坚强，在将近二十年斗争中，遇到不少挫折困难，但从来没有屈服动摇过，从这方面考虑，他遁入空门苟且偷生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后，如自成不死，战斗多年的农民军不会迅即分裂溃散。当然，我之所以作出否认自成成为僧的论断，最重要的还是证据，主要是总督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殉难的奏报。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近几年来有人提出种种设想或不同看法，或进一步阐明“逃遁为僧”之说，或创为“设疑代毙”之论，但我仍持自成殉难旧说，我倒不是从对农民领袖评价问题出发，我认为殉难说更符合历史实际，更具有说服力。

二、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考

李自成既然没有到石门县夹山遁入空门，那么，他死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写《晚明民变》时遇到的又一个难题。这时我看了《明史》和《清史稿》，还读了一些专记述明清之际有关农民战争的文献。最后我把各种不同记载作了比较，采取了殉难通山县九宫山之说（《晚明民变》，页158—159）。

关于李自成殉难地点，清初文献诸多异说。几部比较流行的书如《明史纪事本末》、《平寇志》、《后鉴录》、《明季遗闻》等书皆作罗公山。按罗公山在湖南黔阳县，李自成本人似从未至此，显系互相转抄，以讹传讹。当时诸作者未曾详究，致此说流传颇广。更多文献记为九宫山，但又有两说，《明史·李自成传》、《绥寇纪略》、《南明野史》、《明亡述略》等书皆作通城县九宫山，《烈皇小识》、《荒书》则作通山县九宫山，《清史稿·阿济格传》作通山而不言九宫山，《清史稿·尚可喜传》则书九宫山不言通山县。因为直接和农民军接触的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明确指出自成死在通山县九宫山，我对何的奏疏比较重视。但九宫山到底在何县仍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我曾对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这路农民军向河南、湖北、江西进军路线进行考察，路经通城、通山都有可能，从行军路线很难作出准确判断。最后只有求助于明代志书了。据《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九宫山在通山县东南八十里”。据《明史·地理志》，谓通山县境“东南有九宫山”。两书记载相同，九宫山确属通山县，足纠《明史·李自成传》、《绥寇纪略》诸书之误。我写《晚明民变》是据此将李自成殉难处写为通山县九宫山的。遗憾的是，当时僻处山乡，没法参考康熙《通山县志》和康熙《武昌府志》，这两书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实。

解放以后，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掘出更多的文物和文献，如早期的地方志书，族谱史料，更

具体地记录下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殉难情节，这都是无容置疑的信史。通山县文化馆收藏的鎏金马镫，和尚未寻找到的闯王宝剑，也可作为论断自成殉难通山县的辅助文物。

据最近看到其他同志转引康熙《通山县志》：顺治二年五月四日，李自成农民军数万进入通山县境，在这里约驻扎三个月。更参酌自成死后农民军“满营聚哭”等情节，大顺军将兵大概就在自成殉难处举行了葬礼，掩埋了尸体，然后才转入湖南省境的。

三、殉难经过及年月考

关于李自成死亡过程及情节也有异说。清方追击李自成农民军的主要负责人是英亲王阿济格，据他奏报：“自成窜走时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九宫山）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清世祖实录》，卷十八，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明史·李自成传》则“缢死”与“脑中锄死”两说并存，仍未摆脱阿济格奏报的影响。阿济格奏报系根据大顺“降卒及就擒贼兵”。阿济格奏报自成之死可据，“自缢”说则是错误的。自成久经沙场，果毅刚强，即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也会奋勇战斗，不会自杀。继阿济格奏报之后，地方大吏也纷向清廷上疏祝贺。李自成原为明方团练乡兵所杀，清军旋即占领通山。清总督军门佟岱出于政治的目的，对杀戮李自成的程九伯特给奖赏，札委德安府经历。

记述李自成殉难经过最详实而可靠的，是明方总督湖广四川云贵两广军务的何腾蛟。自成死时，南京明王朝已面临崩溃。闰六月，明唐王聿键称帝于福州，号隆武，这时何腾蛟一再奏陈李自成死事。大概朝内有人对李自成死事有所怀疑，一是李自成既已被杀，为什么不见他的首级？二是自成势众力强，怎么会死于乡兵之手？隆武帝下令要何氏详细回奏。于是何腾蛟奏上众所周知的《逆闯伏诛疏》。为了有助于对李自成殉难过程的理解，兹摘录要点如下：“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事：……然闯势

实强，闯夥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淫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民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驻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时值夏日炎热，自成的首级“已化为异物”。以上是何氏陈明没有获得自成首级以献的原因。但从归降南明的自成旧部将和士卒“无不众口同辞”的口供考察，自成殉难过程是可信的。何腾蛟接着解释自成死于乡兵之手的经过，他说：“今日逆首已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最后，何腾蛟奏陈农民军归明的转变过程：“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闯逆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余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文秉：《烈皇小识》附录：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何腾蛟这封奏疏上于隆武元年，日月不详。按自成战殉后，农民军顿失领袖，陷于混乱。是年六月，诸将田见秀、吴汝义等由江西宁州进入湖南、浏阳、平江等县，刘体纯也率兵由武昌至平江。大概在是年七月，以上诸将陆续归明，在何腾蛟直接统率之下，何氏才得从这些人的言谈中详知李自成殉难具体情况。何这封奏疏是最可靠的信史。他上这封奏疏的日期大概在隆武元年七月下旬或八

月上旬。这时明清双方兵力对比，清强而明弱。何腾蛟身为五省总督，实际兵力有限。农民军之投明，显系出于当时的民族观，从而加强了抗清的力量。

杀害李自成的团练乡兵，即明朝部署的地方上的地主武装。前面所说亲手杀死自成的程九伯大概就是地主武装的一个头目。李自成并非死于清兵之手，阿济格不愿将杀自成之“功”归于明方，而捏造出一个被“村民”围困“自缢”身死。何腾蛟所奏“团练”“乡兵”“截杀”等情更符合实际情况。

自成殉难年月，诸书记载分歧。《明史·李自成传》系于清顺治二年九月，《所知录》系于顺治二年八月，和实际情况都有距离。《明季遗闻》、《后鉴录》、《鹿樵纪闻》、《平寇志》等书皆系于顺治三年，尤不可据。按清英亲王阿济格奏报自成死事疏上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三日，自成殉难当在此前。《小腆纪年》卷十《附考》，谓自成之死在顺治二年四、五月之间。徐鼐所说经过一番考证，所记与事实比较接近。前据康熙县志，自成农民军于顺治二年五月四日进入县境，在县停留三个月。此志修于康熙四年，上距自成入境相距仅只二十年，当地人记当地事，当最为可靠。另据何腾蛟奏疏，自成“每行军，大队在前，已率数十骑在后”。（《烈皇小识》卷八）自成进军通山县当也不例外。五月四日乃农民军进入通山县境的日期。据此，自成殉难当在五月四日之后。综合各方记载，自成遇难日期当在五月中下旬，最晚不迟于六月上旬。自成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死于大顺永昌二年（1645），享年三十九岁。

——文治脱稿于北京三里河，时1986年2月12日

李自成的归宿问题

姚雪垠

1985年10月下旬，在湖北通山县举行了“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出席明史专家及研究者数十人。经过数日充分讨论，锤定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北麓牛迹岭毫无疑问，而在湖南石门出家说纯系附会，毫无直接史料依据。我在讨论会上两次即席发言，得到与会专家学者首肯。现将两次发言要点加以补充，写成此文，就教于关心此一问题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混乱议论的出现及问题的必须澄清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当时人的著作中认为是“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虽然在具体经过的细节上不统一，但是在记述李自成的结局是死于九宫山这一点上没有分歧，吴伟业因不明地理，将九宫山误为属湖北通城县，他在《绥寇纪略》中专用一卷写李自成的败亡经过，题目就写做《通城击》。由于吴伟业在明清之际的声名很大，《绥寇纪略》也是一部出版较早而影响也较大的纪叙明末农民战争史事的著作，其它书踵其错误，尤其是清代官修的《明史》中的《流贼列传》基本上取材于《绥寇纪略》，所以三百多年来“通城”的误说差不多成为定论。清代较早的《通城县志》不载此事，到同治年间纂修县志时才将《绥寇纪略》的误记加了些附会的话，写了进去。解放初，通城县根据错误记载在离城五里的俗名九宫山的小山脚下，修筑李自成的坟墓，并请郭沫若同志为墓碑题字，遂使这一错误说法，在解放初进一步得到“确认”。

通山县有一位王如江同志，从一九四八年起任小学历史教师。在当时的的小学历史课本上均记载李自成死在通城九宫山，通山县的学生们根据本地代代相传的说法，提出疑问。王如江同志一时不能对学生们作出满意的答复，迫使他搜集并整理了关于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下午迹岭的零星传说，查阅了《通山县志》和杀害李自成的元凶程九伯家族传下来的宗谱，于1954年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求教。《历史教学》编辑部于1955年秋天回了他一封信，旁征博引，论证了李自成确实死于通山九宫山无疑。不久，这封回信也在《历史教学》上公开发表，题目是《关于李自成殉难地的考证——答读者问》。写这篇考证文章的是李文治同志。他于三十年代初专力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于193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晚明民变》。虽然解放后有关资料陆续出现，认识继续发展，但是李文治同志的这本书是将明末的头绪纷繁的农民战争史第一次整理得头绪清楚，功不可没。李文治同志的考证文章发表后，郭沫若同志声明取消了他原先的意见，李自成死于通山说遂成定论，通城说不再被人称道。

通山说得到确证之后，从1957年起，历史课本即依据新的结论修订了课文，而通山县也将李自成草葬处修建了闯王陵和展览馆。由于通山文化馆的努力，继续搜访到一些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和当地流传的口头史料，进一步丰富了李文治同志的考证。

从清代中叶开始，就出现了两种说法向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说挑战：一是在湖南黔阳县罗公山隐居善终；一是在湖南石门县夹山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前一说始终没有什么影响，可以不谈。夹山为僧说在晚清人的著作中即受到批判，可以说十分荒唐。但是，在十年内乱结束以后，湖南有一些同志，尤其是石门县的同志，对夹山为僧说特别感兴趣，利用报纸和刊物，并举办学术座谈会，竭力宣传，使本来很清楚的重大历史定案突然受到了冲击，使一般人的认识发生了混乱，影响了中小学历史课本的编写和历史教员的讲课。这种不正常现象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文化界和史学界的重视。我们应

该对祖国的历史负责，对中小学的历史教育负责，同时对社会主义的健康学风负责。不久前在湖北通山县举行一次“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青年研究者通过几天的百家争鸣、科学论证，重新肯定了李自成确实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北麓的牛迹岭。这一结论，湖南石门县出席的同志们也感到无话可说，全体与会者都对讨论会的学风和成果表示满意，认为不仅解决了全国关心的重大历史问题，而且讨论会上所发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也使同志们受到教益。

（二）李自成悲剧产生的主因及其败亡路线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宏观上说明当时的历史形势。

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间在豫西歼灭了孙传庭所统帅的明朝在中原和北方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乘胜进入潼关，不战而克西安，改西安为长安，决定建为国都。从占领西安到第二年（1644）春天长驱幽燕，攻破北京，是他军事胜利的顶峰，同时在辉煌胜利的掩护下也迅速滋长了失败的严重危险。李自成及其多数文武亲信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误认为一到北京，正式登极之后，江南可传檄而定，但据野史所载，田见秀深为忧虑，只是形势已成，无力扭转。

当李自成军事胜利达到高峰时，所占领的地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宁周围、河南全省、湖北的大部分、山东的大部分、畿辅地区和河北的大部分，还有一部分人马进入苏北。但是除在关中地区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建立稳固政权。就以关中而言，也没有使人民有机会休养生息，而是依然疮痍未复，为支持战争而负担沉重。这是大顺政权的第一个致命弱点。

由于在各地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权，更没有恢复生产，所以不能供养足够的作战部队。所谓有“百万之众”，实际是虚夸之词，连随军眷属包括在内也不会达到百万。据我估计，李自成在武力最盛时

可以作战的将士约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从来没有超过五十万。由于兵力不足，又加以分散于广大地区，所以既不能巩固各地政权，镇压敌对力量，更不能应付骤然出现的重大战役。在清政权与吴三桂联合进攻时，李自成无力抵抗，甚至在山海关一败之后不但没有反攻力量，也不能组织有力的阻击战。这是大顺政权的第二个致命弱点。

大顺君臣只看见灭亡明朝已成为摧枯拉朽之势，而对于清政权的强盛和进入中原的野心懵然无知，根本没有应付战局变化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包括军事）准备，只以六万孤军进攻北京。假若吴三桂不在路途耽误，提前三天到达北京城下，大顺军决不会轻易将北京占领。或者没有吴三桂，而清兵按原计划从蓟州和昌平之间越过长城，到达北京城外，大顺军的处境也不可乐观。对宏观局势的无知，在战略上的短见，是大顺政权的第三个致命弱点。

李自成进了北京之后，君臣们忙于两件事，其一是忙于筹备登极大典，其二是忙于拷掠追赃。由于吴三桂不肯投降，据守山海关，对北京威胁很大，使登极事一再延期，损伤了政治威望。最严重的失策是拷掠追赃，使大顺政权在政治上陷于十分孤立，造成地主阶级广泛的敌对、恐怖和不安。吴三桂的拒降虽然原因复杂，但是也与李自成在北京的政治表现和失去“人心”有一定关系。进北京后由于政治上的缺乏远见，不能按照建立新的封建帝国的规律（或需要）制定策略，是大顺政权的第四个致命弱点。

由于以上的致命弱点，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连锁反应，军政两方面迅速崩溃，直至灭亡。

李自成为三月十九日破北京，迫使崇祯皇帝自缢，摧毁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中央政府，从表面看是空前胜利，而实际上一进入北京便因后备力弱，在战争形势上陷于被动。当时即令没有山海关之战，只要清兵自长城某处进来，加上吴三桂的反攻，李自成也必然退出北京，影响全局。

李自成为什么不能够固守北京以维系全国人心呢？因为第一，

李自成已经以西安为京城，进北京只是为着摧毁崇祯皇帝的明朝政府、举行登基大典、拷掠钱财，而不打算以北京作为新朝首都，所以目光短浅，在思想上、战略上、兵力上、政策上……都没有统盘筹划，作出相应的妥善安排。

第二，由于兵力不足，李自成率领到北京的虚称二十万，实际只有六万人，是一支远征孤军，而在山西、河南和冀南的兵力都很少。如果吴三桂与清兵合力围攻北京，李自成不可能及时得到强大的援军。

第三，北京的粮食靠江南通过漕运接济。李自成破北京后，江南已成敌国，漕运中断，北京的军粮民食没有来源。止此一点，北京也没有固守条件。

第四，北京人心不稳。进入四月份，北京士民对大顺政权的不满日益明显，城内出现了反对大顺政权的无头揭帖。而且受了吴三桂的宣传，城郊有不少人暗制白帨，准备一旦吴三桂来到，便为崇祯皇帝服孝。人心如此，没有士民支持，要固守北京是不可能的。

不稳定的局面拖延到四月中旬，李自成可能得到清兵即将南下的探报，决定抢时间亲自去山海关打败吴三桂，然后对付清兵。宋献策看到局势危险，苦谏不听，李自成毅然东征。李自成留守北京的约一万人，随他东征的约五万人，另有唐通的降兵数千，战斗力很弱。这是远离根据地和没有预备部队的孤军，在古代军事术语上叫做“悬军远征”，从形势上说叫做“孤注一掷”。四月二十日，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精兵在山海关城西数里处的石河西岸展开激战。大顺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但吴兵以逸待劳，又有雄关可凭，所以这一天不分胜负。恰在当天下午，多尔袞率领的清兵赶到山海关外的欢喜岭了。

满族是女真后裔，清太宗皇太极的夙愿是重现金太宗完颜晟的盛世局面，即进入中原，占领黄河中下游与淮北各地。他于一六四三年秋天突然病故，多尔袞拥立他的幼子福临继位，多尔袞雄才大略，是满族的杰出人物。一听说李自成可能攻破北京，他就决定亲

率满、蒙、汉八旗大军南下。当时不知道吴三桂的情况，决定从中协或西协选择一个地方突破长城口子，进入北京附近。离沈阳后走了四天，忽接吴三桂请求借兵援助的信，遂改变进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这样，既可以乘机迫使吴三桂投降清朝，也可以实现占领山海关的多年梦想，多尔袞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欢喜岭的威远堡，吴三桂果然投顺。当夜清兵进入关内，作好部署。二十二日上午，李自成与吴三桂继续在石河西岸大战，战正酣，狂风忽起，飞沙扬尘。移时风止，清骑兵自三桂阵后呐喊杀出，锐不可当。大顺军处于绝对劣势，无兵增援，死伤惨重，步兵几乎被全部歼灭，刘宗敏亦负重伤。李自成先退永平，收集残部。二十六日，李自成仅率领残余骑兵七千逃回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草草登极。三十日黎明退出北京。吴三桂奉多尔袞之命，并得到孔有德和尚可喜等人所率领的清兵相助，穷追不舍。五月初三日，李自成因得到从保定来的援军，在定州清水铺阻击追兵，大败，大将谷可成阵亡，左光先坠马。将士死伤甚重。初五日，李自成在真定亲自指挥人马还击，又大败。自成中箭落马，被左右救回营中，伤重，卧于民舍。村民怨恨大顺军，夜间纷纷自焚庐舍，火光烛天。大顺军不断惊慌移营，遂焚辎重，拔营西走，由固关进入山西。当时曾传说自成阵亡，足见失败的严重。

北京是金、元、明三朝首都，历史的政治名城，政治与军事意义极其重大。李自成不理解包括多年来明清斗争的中国北方的全面形势，没有经营河南、山西和冀南三府作依据，兵力很少，盲目北伐，误以为攻破北京即可以天下大定。战略上一步失误，不可挽回。由于山海关的大败和北京的仓皇退出，李自成不仅在军事上完全陷入被动，而且在声威上受到了致命挫折。跟着而来的是河南、山东各地纷纷反水，对大顺朝任命的州、县官或杀死，或捉拿，或驱逐，使大顺极不稳定的地方政权迅速瓦解。山西省各州、县地方，反大顺的武装斗争也不断发生，不可遏止。近人多歌颂李自成攻破北京是伟大胜利，我一直持相反意见，认为李自成攻破北京是一种